

資 政 史 鑑

用人卷

编委会主任

叶选平

总主编

邢贲思 戴逸

葉選平題



人民出版社

资政史鉴

【用人卷】

编委会主任	叶选平	
总主编	邢贵思	戴逸
副总主编	周溯源	和宏明
本卷主编	高自龙	
本卷副主编	揣振宇	臧恩钰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编辑:陈开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政史鉴·谋略卷/邢贲思,戴逸总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

ISBN 7-01-002883-4

I. 资...

II. ①邢... ②戴...

III. ①领导学-中国-文摘 ②谋略-中国-文摘

IV. 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097 号

资政史鉴·谋略卷

ZIZHENG SHIJIAN · MOULUE JUAN

马 赫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艺辉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91

字数:16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2883-4/K·593 定价:286.00 元

(全十卷定价:2860.00 元)

《资政史鉴》编委会

主 任

叶选平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守和	白 钢	刘国光	苏 星	苏双碧
李学勤	吴建国	启 功	张岂之	张岱年
李维林	金冲及	赵宝熙	袁宝华	廖盖隆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勃军	王梦奎	王 晨	尤开元	许中田
涂 僧	关壮民	孙楚寅	李传华	李权时
李源潮	张丁华	张作耀	张明达	陈至立
林炎志	杨崇汇	尚 文	房凤友	赵可铭
侯树勋	贾天增	郭超人	顾秀莲	梁金泉
黄远志	韩立成	楚 庄	臧恩钰	戴 舟

凡 例

一、本书是一部大型的领导类工具书，其宗旨是为社会各界领导干部提供中国历史上可资学习、借鉴和参考的为官的成功经验、典型事例和教训。

二、本书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中国从上古直至近代各历史时期多方面关于为官从政的史料，并按其具体内涵编写成十卷：为政、谋略、理财、用人、革新、修身、处世、治事、清廉、教训。

三、每卷结构为：序、前言、卷首语、导读、篇、节。序、前言为各卷共有。各卷卷首语用以提纲挈领地介绍该卷内容和论述主要思想观点；每卷分为比例大体相等的二十篇左右，每篇的开头有五千字左右的导读，对本篇内容作简单的评议；每篇分若干节，每节下含若干自然篇。

四、内容编排不以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内容事理逻辑为序，篇、节、自然篇（都拟有标题）三个层次，层层相扣，围绕该卷主旨展开。

五、自然篇中的“白话文”部分是在忠实于后附“主要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并对人物、情节、背景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补充，以求“信”、“达”，便于阅读理解。

六、“主要参考文献”所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版本。

七、本书数字用法：朝代历史纪年、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前 722 年）、明嘉靖三年（1524 年）等；文献出处的卷次也一律括注阿拉伯数字；其他文中数字一律用汉体写法。

八、“主要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先秦以前的史料只标注书名、篇章，如（先秦）《荀子·不苟》、《论语·子张第十九》等，先秦以后的史料则标注朝代、作者、书名、卷次或××列传，如（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58）等。

九、本书文字除个别历史人名如魏徵等遵循历史习惯写法外，全部采用标准汉字简体写法。

序

李瑞环

中国古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了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如何使人类这一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为振兴中华服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

1987年秋,我在《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序言中曾寄语有志于此的专家和学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浩瀚的古文献进行整理选编,按不同专题辑录成书。我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同志们的响应,很快编成《从政史鉴》,出版问世。我国几千年来诸多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乃至“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布衣之士,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论述,政事活动的经验、体会,荟萃一书,既博且精。这本历史教科书,对于一切乐于和善于学习的政治活动家、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群众社会工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多年来,我一直倡导要重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几次动员、组织若干专家学者投身于此项工作。我所以如此热心于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对历史有什么癖好和偏爱,更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我始终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具有承继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

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历史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就决定了：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历史。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这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和殉国家之急的爱国的崇高情操，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益。可以说，现实的中国是无数代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的结果，是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因此，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认识现实的中国，而且需要认识历史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决不应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就会在不断重温伟大祖国的光荣史和悲惨史、斗争史和苦难史中，吸取热爱祖国巨大力量，激发自己作一个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真正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还历来认为，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这就决定了若干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不但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有的，而是经过不同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共同创造的成果；它也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服务。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文明遗产的阶级性，又要重视它的承继性和借鉴性。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历代王朝交相更替，阶级关系不断变化，但人们在改造自然、治理国家、提高自身素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接受、利用和借鉴的。且不说中国兵、农、医、艺的实用文化，诗骚曲赋的文学精粹，民谚俚俗的熠熠智慧，即使在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成就事业等方面，我们的先辈所提出的许多至理名言，都使后人受益无穷。诸如“正奇互补”、“乱极而治”的朴素辩证法，“民为贵”、“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魂系中华、“爱国如饥渴”的民族凝聚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进

取精神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闪耀着哲理的光辉,其中有些东西一旦赋予新意,便可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那种把所有的历史文明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是“左”的庸俗社会学。

要继承、借鉴好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就要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廓清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的总结,取其精华,剔其糟粕,鉴往而知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对古文化遗产抱残守缺、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而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甚至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把我国悠久的文化斥之为历史“积淀”,视为沉重的“负担”,更是极其有害的。时至今日,许多东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文化。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与发掘,倒显得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不是深了而是很浅。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从政史鉴》的编辑成书,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有益的探索。我为《中国历史文献精粹大典》的出版曾讲了上述一些看法。这里不烦重复,再次强调,目的在于引起更多同志的重视,期望一切锐志于改革进取的学者专家们投身于这项挖掘古文化遗产的开拓工作。是为序。

〔注:本文原为《从政史鉴》一书的序言,李瑞环同志同意用作本书之序。〕

前 言

汲取历史智慧 提高领导水平

邢贲思 戴 逸 周溯源

一、《资政史鉴》的由来

公元1084年，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诞生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认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欣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写了一篇序言。《资治通鉴》一经问世，便对中国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官吏子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人们评价它的作用：“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已影响了中国历史近千年，无疑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公元1998年，一部与《资治通鉴》名字相近的总结概括历史经验的历史著作《资政史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0卷，分为政卷、理财卷、谋略卷、用人卷、革新卷、修身卷、处世卷、治事卷、清廉卷和教训卷，每卷160万字左右，全书总计1600余万字，由数百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历经六载，集体编撰而成。编撰者们均系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从事史学、政治学、领导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或教学人员，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求是杂志、九三学社等单位。

为什么要编撰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书呢？一句话：总结历史遗产，丰富领导科学，增强干部素质，提高领导水平。

领导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兴起。每年陆续有新的论文、论著发表、出版。这些论文、论著，有介绍国外的，有研究中国的。十

多年来,这方面的书已出了数十部,论文则成百上千。有的书已为读者熟悉,诸如《治策通鉴》、《从政方略》、《古镜百鉴》、《国史镜鉴》等等,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推陈出新,各有千秋。这些论文、著作的发表、出版,无疑丰富、繁荣了我国的领导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广大干部的需要和渴求。但它们大多篇幅不长,或则几十万字,百多万字,至长者也不过几百万字。取材也是侧重于某个或几个方面,尚未涵盖领导科学的所有主要方面。特别是对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领导科学的发掘整理,还很不充分,还有很大的余地,有许多工作可做。那么,可不可以出一部大而全的书呢?它从二十六史,从经史子集以及有关的书中,广泛选取与为政有关的史料,编译成白话,分门别类,供领导干部学习、借鉴,以满足广大干部不断增长的需要呢?本书的主编、顾问、编委和作者们就是这样考虑和追求的。历经六个寒暑的辛勤劳动,通力合作,并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热诚帮助下,终于使这部大书得以问世。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经验

我们之所以编著《资政史鉴》,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学部分,有不少精华,有批判继承的价值。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政治活动以后,就开始逐步积累从政经验,有人就开始研究政治艺术,探讨领导科学。领导活动虽然是主观活动,但它又有客观的一面,为政有道,治国有方,安邦有法。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黄河一样源远流长,从遥远的上古奔腾而来,滔滔汨汨,不止不息。黄河的中华文明与尼罗河的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恒河的古印度文明,并称世界四大古文明。但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文明早已中断,唯独中华文明如养育它的黄河一样,奔流不断,一往无前。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灿烂的文化,其中无疑包含了我们的祖先在政坛上积累的大量经验、领导艺术,这些从政经验和领导艺术中的优秀成份,闪烁着人类理性的光芒,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精华。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有许多杰出的帝王将相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群山中,耸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奔涌出一溪又一溪的思想清泉;在专制和愚昧造成的漫漫黑夜里,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的智慧明灯。他们为了生存发展,为了“修、齐、治、平”,程度不同地作过可歌可泣的拼搏。他们面对迷离混沌的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的人间社会,变幻频仍的人生祸福,周而复始的战乱和平,在那里呕心

沥血,上下求索,探寻着那数不清的“为什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与命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派与体系,企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他们批判“苛政猛于虎”的剥削制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呼声,发现了“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人不相预”、“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客观规律,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积极主张,揭示了名实关系、分合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动静关系的辩证法,高扬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旗帜,到近代则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认识,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放射出一次又一次的灿烂光芒。中国在几百年以前一直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曾经在许多领域登上过当时的科学的高峰,与他们的这些理性认识和成功实践无疑是分不开的。

领导活动是艺术,也是科学。不能设想,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而且多次出现盛世的局面,如果没有一些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历史规律的政策和策略,没有一批明君、贤相、志士仁人对国家的尽心治理,励精图治,而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历史文明。所以,对我国古代的领导科学,应该肯定有精华部分,对这些精华部分应加以总结,并且批判继承。

首先,古代思想家认识到领导活动是一门科学,必须遵其“道”方能成功。早在战国时代,荀况就已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君主拥有最高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道也”。也就是说,必须实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有道才能兴邦,无道必然亡国。南宋学者叶适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单凭权势治国的道理。他说:权势只能强迫人服从于一时,道义才能令人心服。所以,“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以符合道义的方式运用权势,才能长治久安。

其次,关于民本主义,这是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社会学说之一,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这种学说认为,民众是国家或社会的根本和决定力量,统治者要重视民众的作用和利益,尊重民众的意志和人格。民本思想,主张“重民”、“利民”、“富民”、“爱民”、“恤民”。民本主义在我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思想渊源甚早,远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了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季梁、史墨等人明确指出,决定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是人不是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不重视人而重视神,国家必然灭亡。这在当时天命论占统治地位并主宰人的思想的时代,无疑是一次思想突破。老子和孔子也都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民的重要作用也多有论述。

重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民本思想的提出。在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的,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孟轲。他大胆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甚至说,君王无道,民可以弑君。

战国末期的荀子,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他用水比民、舟比君的比喻来说明民众的作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真正有力量的是民众。他提醒国君要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他还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只有民富了才有国家的富强。后来的韩非、吕不韦对这一思想有进一步的发挥。

到了汉代,民本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汉初著名思想家贾谊,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写了一部包括《过秦论》在内的《新书》。在《新书》中,民本思想得到了新的阐扬。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宋明以后,民本思想继续发展,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程颢、程颐认为:“民惟邦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文集》卷五)。这类民本思想,宋代的司马光、朱熹,明代的张居正莫不认同,都有论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都对民本思想有所发展。到近代之后,又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进一步发展成近代的民主思想。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将它引向了“民为邦本,吏为公仆”的理想大同世界。

第三,关于治民之术,古代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专制制度下,君主权力高于一切,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惩罚。四千年间,皇冠落地,王朝倾覆,屡见不鲜。于是,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不可等闲视之,治民之术大有讲究。例如大思想家荀子,他用三种形象化的比喻说明君民关系:一比人民像拉车的马,统治者是坐在车上的人,马安静地走,车子平稳前进;马惊恐暴怒,车子和人都会粉身碎骨。二比人民是江河湖泊的水,统治者是水上的船,风平浪静,船安稳地在水上航行;狂风巨浪,船会埋葬于惊涛骇浪之中。三比人民是鸟,统治者是树,鸟选择树,树不能选择鸟,树好鸟来,树坏鸟去。

先秦各家的治国方略,都涉及采取何种措施以保持政权的稳定。如孔、墨主张爱民、利民,孟子要统治者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设身处地地替人民群众考虑,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吕氏春秋·顺民》中认为“顺民心,功名成”,刘向《说苑·政理》中指出“治理之道,爱民而已”,《贞观政要·君道》中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等等,都是颇有见地的。

第四,关于用人之方,古代也有很多精彩的言论和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

历代君主是通过官吏去治理人民的,这样,就产生一个用人问题。我国古代,人治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是其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君主只要选择好官吏,安抚好民众,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唐太宗说:“至安之本,惟在得人”;清雍正皇帝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由于重人治,所以对用人之道也就特别讲究,作了许多探讨,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历代用人之方无非是如何发现、识别、使用、培养人才。人才的标准不外乎“德才兼备”，“德”是对统治阶级忠诚，“才”是具有管理国家的才能。

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诸葛亮等，都对用人的问题作过探讨，留下了精彩的论述。

第五，关于中华民族精神问题。

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必然有其精神支柱，精神力量。上古文献《周易》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自强不息”，一句是“厚德载物”。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天体、日月、星辰，昼夜运行，今天太阳从东方出来，明天太阳也一定从东方出来，太阳不会懒惰，永恒运动，许多行星也是这样，那么，人就应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努力向上，决不停止。自强不息观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厚德载物”，大地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什么东西在地面上都可生长，那么，人就应胸怀广大，无所不容。这些思想观点，反映在民族关系上格外明显。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坚强不屈的，不向任何外来势力屈服，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反对扩张主义，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点一直指导、鼓舞着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可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

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许多的优秀成份，在此前言中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作用，得到了西方有识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同。就以孔子的国家管理学说为例，当其传入欧洲以后，曾经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之一。在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狄德罗为代表）把孔子的治国理论、管理思想作为无神论和唯物论来接受。在德国，古典哲学学派（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则把孔子的思想作为辩证法和观念论来接受。尤其是在法国，许多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为孔子的治国理论所倾倒，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十分推崇孔夫子，致使他本人被认为是“欧洲的孔夫子”。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在1795年的法国宪法中，就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宪法。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经验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甚至提出了“全盘中国化”以拯救当时欧洲的社会危机。直到近代和现代，孔子的思想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里仍受到无上的尊崇。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它们重视运用儒家思想不无关系。

毋庸讳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必然有其历史特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有它的糟粕，有过时的成份。我们今天来研究、介绍、总结它，决不

是不加分析地和盘托出,连那些糟粕、那些过时的成份也要人们借鉴。而是批判继承那些优秀的成份,那些有现代价值的成份。在我国历史上,有些著作是名副其实的的不朽之作,例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等,它们世代相传,令人百读不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人类存在,它们的智慧之光就永远不会熄灭,它们照耀着人类的过去,也照耀着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因为它们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只要人们正确地运用它,它就会给人们带来效益。

三、领导干部必须读史知史,增强历史的眼光

我们之所以编著《资政史鉴》,因为我们主张读史知史,增强历史的眼光。

历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又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一门永远没有句号的学科,一门常讲常新的学科。它是人类经历的记录,成长的记录,进步的记录。“读史使人明智”。人们要更好地认识今天,就得正确地了解昨天与前天。历史是人们的必修课。史学的鉴往知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很早就为人们所重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尊史》)鲁迅说:“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章太炎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他还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他们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和爱国的前提。自觉重视历史的学习,是人类走向成熟的表现。正如李大钊说的那样:“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史学要论》)他认为,这种“智力的老成”,有利于人们去创造“新世界”。今天,我们之所以继续提倡读史知史,增强历史的眼光,除了前人讲的道理外,还有新的原由。

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是我党多年来奉行的思想路线。怎样理解“一切从实际出发”呢?如果细分一下,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二是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既要有现实的眼光,又要有历史的眼光。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很重视历史科学,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他们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那

里开始。“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研究了整个历史,因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办事看问题,如果只看到现实因素的一面,而忽视了历史因素的一面,那么就不全面了,就是半截子的从实际出发,就会出现偏差。

第二,历史与现实虽然有区别,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实是正在展开的实际,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实际,过去了,但它仍然存在,即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果”来源于历史的“因”。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现实是历史的产物,而将来又是现实的产物。历史可以忘掉,但不能抹掉;可以不提及历史,但不能割断历史。特别是历史文化,它的演变是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逐渐被改变的,要抛弃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先进的机器引进了便可把旧机器废止不用。因为历史文化已经溶入民族的血液之中。现实的一面是外在的、显露的,历史的一面则是内在的、深沉的;现实的一面比较容易看到,历史的一面则易被忽视。然而,人们真正了解了历史,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遇到的生活条件、社会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以及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被保留下来的,应当如何去改变它。所以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哲学史讲演录》一卷,导言)

第三,历史对现实时时发生着影响,起着制约作用,或是推力,或是阻力,或是活力,或是惰力,或是几者兼而有之。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四大发明,文化灿烂,这一切都是历史,不是现实,但它对活着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起着鼓舞作用。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贞观之治的唐太宗,金戈铁马的忽必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勇于变法的王安石、张居正,诗坛的李白、杜甫,词苑的苏东坡、辛弃疾,一代名相诸葛亮,民族英雄林则徐,……每个中国人一想起这些“风流人物”,莫不肃然起敬,力量倍增。而当想到近代史的屈辱,想到曾被西方视为“东亚病夫”,则莫不沉痛,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更加强烈。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但我们地大人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社会生产力落后,科学文化水平尚不高等等这些历史原因,使我们在四化建设中不可能不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制约我们的前进速度。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华,但也有不少糟粕。例如某些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门阀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家长作风、因循守旧、男尊女卑、迷信鬼神巫术、迷信“八字”命运,等等。这些历史遗留物,无不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建设发生摩擦或冲突。如果我们没有历史的眼光,就难以看清这一切,就不易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

第四,多一点历史的眼光有利于我们每个人正确对待各种困难,对待挫折或逆境,保持上进的胜利信心。司马迁写《史记》期间蒙受奇耻大辱的宫刑,他一

度想自杀。但他回顾历史,看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忿》;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忿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于是他振作起来,忍辱负重,继续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终于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就拟了这样一副对联激励自己:“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许多志士仁人都善于从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那里汲取力量,勇于拼搏,终于干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第五,掌握历史知识是衡量干部素质的重要依据之一。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历史知识,就很难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来。有位英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名为《历史的功用》的书,认为文官“如果想跻入高官之列,历史是必经之途”,因为“文官应付的行政问题,历史能提供正确的背景”。他风趣地举了一个例子,韩德生爵士是1937—1939年英国驻德国大使,由于他不懂德国历史,对德国侵略的历史一无所知,所以对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没有半点预感和警惕。作者嘲笑这种不懂历史的外交官是“三流头脑而居一等高位置”。由于他历史知识的欠缺而带来莫大的损失。另外,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其所著《历史》中说得很明白:“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要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不二法门,除此以外别无他途。”(郭圣铭:《西方史学概要》第55页)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就是因为他不学历史的缘故。历史知识是提高人的聪明才智的重要教材,是训练干部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教材。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他不但对中国历史十分熟悉,对外国历史也很熟悉。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在和毛泽东交谈之后说:“毛泽东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十九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页)。毫无疑问,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知识渊博、思想和文采都独领风骚的伟人,是和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分不开的。

历史中存在着丰富的智慧。历史智慧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知识的结晶,它永远不会“死亡”,仍有活泼的生命力:它可以使人们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高瞻远瞩;它可以使人们储备大量的参照体系,彰往察来;它可以使人们从对历代的兴亡盛衰、前人的成败得失的体察、理解之中,学到许多聪明才智,不重犯前人的错误,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一个人的头脑里传统文化的精粹积累得越多,他的历

史眼光将会越深邃,实现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会越强烈,从而在现实的舞台上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的价值。

四、弘扬重视历史借鉴的优良传统

我们之所以编著《资政史鉴》,因为我们提倡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历史借鉴的优良传统。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重视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求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而历史借鉴的思想,则是每个民族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历代都很重视历史借鉴。中国传统史学“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究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自古被当作治国之学,智慧之学。中国史学思想中的历史借鉴的思想尤其丰富、突出,这从以下几点足以证明:

第一,中国史书之丰富、记事之系统、体例之完备、史学家之众多,是举世无双的。既有民间修史,又有官方修史。从唐初开始,中央政府历代设有修史的机构,以总结上一朝代的经验教训。皇皇二十六史,加上其他史书,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第二,最高领导者重视历史。汉高祖刘邦,原本读书不多,文化不高,“马上得天下”以后,开始重视历史学习。他令文臣陆贾总结秦亡的经验,每写完一篇就念给他听,听到妙处,拍案叫好。他自己有时召集文臣武将讨论历史,发表见解。有一次他同大家谈论为何项羽败在他手里,其历史分析令众人心悦诚服。唐太宗李世民,格外重视历史的借鉴。他深有体会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至于宋英宗、宋神宗,则要求并支持司马光等人写出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亲定书名,并赐序言。毛泽东重视历史是尽人皆知的。他把学习历史提到关系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曾号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在研究理论和现状的同时要研究历史,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534页)。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历史借鉴的大师。例如1944年,正当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推荐给全党学习。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7、948页)李自成是明末著名农民军领袖,进入北京城后,